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尚书校释译论 一

顾颉刚 刘起钊 著



中 华 书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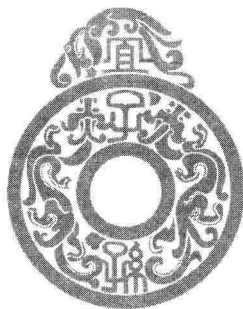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尚书校释译论 一

顾颉刚 刘起钊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釞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8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13227-4

I.尚… II.①顾…②刘… III.①中国历史-商周时代
②《尚书》-注释③《尚书》-译文④《尚书》-研究 IV.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026号

-
- | | |
|-------|---|
| 书 名 | 尚书校释译论(全四册) |
| 著 者 | 顾颉刚 刘起釞 |
| 丛 书 名 | 中华国学文库 |
| 责任编辑 | 许 桁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4 $\frac{3}{4}$ 插页8 字数1420千字 |
| 印 数 | 1-5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227-4 |
| 定 价 | 260.00元 |
-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余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

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尚书》为先秦儒家两部主要经典之一，起钊弱冠承王先谦先生入室弟子先祖吟古公授读，及长承恩师顾颉刚先生教导。谨积其所学，历时三十余年（1963—1999），备经交困以撰成此书。为纪念师恩，特以与先师合著名义发表，以就正于方家。

序 言

我在1989年6月出版的拙著《尚书学史》书前的“小引”中说：

“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就是《尚书》。它是我国进入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诰语、誓词、谈话纪录等，由史臣载笔写下，经历了多灾多难复杂曲折的流传过程，才从当时众多文献中侥幸获得保存下来的少数几篇。虽然在流传中除西周极少几篇诰词外各书篇大都程度不等地受过后来文字的影响，但总之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夏、商、周政治活动中最早的历史见证，是研究这三代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同时书中更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人文科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各种重要资料。”——这是该“小引”的第一段，说明了《尚书》本身原来的实质情况。它只是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保存了珍贵的古代科学资料。不过被孔子汇编作为儒家两部重要课本之一的历史课本，教授门徒。

“到了汉代，它却被尊奉为儒家‘五经’中最重要的一经，其

间出现了今文、古文不同本子,由此它和《左传》、《周礼》一起(后来还加上其它一些经)引起了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到东晋又出现了伪古文,纠葛更多。然不论发生些什么变故,它总是随着二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发展,始终雄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宝座上,成了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政治与道德教科书,给了汉以后全部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这是该“小引”的第二段,说明原来的一部历史文献,汉代起被奉为儒家教义的神圣经典,作为政治道德教科书的权威,指导着纷乱的封建时代,从而构建了整个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还由它孕育了完整的封建史学体系。

“现在所见到的《尚书》,它的形成过程很复杂,它的篇章内容很晦涩,它的经历情况也很繁乱,在作为中国学术史中心的经学史上的地位很特殊。因此这么一部书的本身情况及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的遭遇和其发展演变大要,就成了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该“小引”的第三段,说明了今所见《尚书》这本书,经历了复杂繁乱的情况。由上二项合此共三项,构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课题,有待加以钻研解决。

由上面三段“小引”文中看到了有关《尚书》的全面情况。知道它原只是一部单纯的史籍,可是后来既被作为中国学术史中心的经学史上的一个重镇,更是备受困厄处于葛藤丛棘的中国最古一部史籍,甚需要恢复其真实面目。在该“小引”的结语中说:“现在把这么一部曾作为经典的重要史籍;根据它的历史演进情况,寻其变迁递嬗之迹……用以作一综览前后的阐述,作为一部粗糙的《尚书学史稿》提出。”复在《尚书学史》后面的“简

短的跋语”中说：“现在，……这部粗具规模的《尚书学史》，作为《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的姊妹篇先行向学术界提出。”

原来现在出版的这部篇幅较大共达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却是那部篇幅较小的四十余万字的《尚书学史》的姊妹篇。二者相辅相成，作为《尚书》之学的两翼，希望能以之稍尽绵力，共同把《尚书》之学推向前进。《尚书学史》以《尚书》一书所经多灾多难迷离扑朔的经历及围绕它在历代所发生的政治的、思想的、学术的各种纠葛为其研究对象，从而以求了解有关《尚书》的各种来龙去脉及其成为这么一部书的递嬗经过之迹的真相。《尚书校释译论》则以保存在《古文尚书》中的汉代今文二十八篇的内容为其研究对象。凡两千多年来有关《尚书》的文字纠葛、内容纷歧、经说争执，以及以今日眼光所能探知其资料来源、神话原貌与其人为的历史化，从而出现的错误认识，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对资料的错误使用，举凡可以探得其真谛者力求探得之。把这部有名的佶屈聱牙难于读通的书，尽量求取粗通其意。真正难通之处，也展明其资料原貌，供学者继续研究。以这种谨慎态度对待，使这作为姊妹篇的两部《尚书》著作，各在其本身领域内力求较踏实地写成。

这两部书的写成，完全是源于吾师顾颉刚先生，他一生研究《尚书》，并提出“《尚书》十种”的出版计划，故1962年冬由中宣部把我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处调来北京，协助顾先生完成他这一科学地整理《尚书》的宏愿。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秉其整理《尚书》的意图与规划，来承乏整理《尚书》全书之责，日夜竭尽绵薄，备经困厄，先后写成的。

在“文革”后期曾听国家出版局徐光霄局长在一次报告中说,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否则读不懂,不好利用。”这句话顾先生在当时是不知道的,不像前此请顾先生负《资治通鉴》“总校”之责,是明白奉毛主席之命;后来负点校二十四史“总其成”之责,是明白奉周总理之命。此时则只是顾先生 1962 年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周扬同志也在,相与谈到《尚书》工作,顾先生以自己体力已衰,推荐在大学时曾从他治《尚书》的我来协助他,周扬同志把我的名字带回中宣部,在一次会议上决定调我来京了。当时把我安排在中华书局任《尚书》研究专职,据顾先生告诉我,当时他和历史所领导的关系搞不好,而中华书局领导金灿然同志热情支持此工作,故做此安排。我幼承原为王先谦先生及门弟子的祖父用心教读传统典籍(其中《左传》曾命我每年点读一遍),至十六岁先祖父弃世时已粗谙古典学术门径,粗具传统文学根底。大学毕业后,阴错阳差搞了十几年现代史料工作,到这时我已四十五岁,正精力旺盛,以为好不容易回到我素所嗜好的古典学术途径上来,获得展布其所学的机会,这是多年梦寐以求的事,又得中华书局给以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因此惬意适意地全力投入工作。

按,顾师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主要是从《尚书》研究得来的。1922 年因对《尚书》和《诗经》《论语》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有名学说。其后在南北各地大学都相继开了《尚书》研究课。发现《尚书》内容涉及到全部古史,特别是儒家构建古帝先王体系,设计理想的政治制度,树立道统中心,及《尚书》成为儒家五经中最尊的一经,成为牢

笼百代的统治思想,都是运用《尚书》来造成的。因此以为要有效地从这四方面来清算古史,就必须用力攻破《尚书》这一堡垒。于是他此后孜孜汲汲地从事《尚书》研究,就按此构想进行。1928年提出对《尚书》中可信的今文二十八篇的看法和考辨计划。1936年编成《尚书通检》。在其序文中提出研究《尚书》的总的打算,一是把《尚书》经文各种字体的本子集为一编,见其变迁沿误;二是辑出唐以前各书引用过的逸《书》;三是搜集历代学者讨论《尚书》之文,寻出若干结论;四是研究《尚书》用字造句的文法,并与甲骨文、金文比较。以为要把这四项做好,“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书的考定”。这些是顾师较早期对《尚书》研究的几次通盘打算,其总的脉络、总的归趣及总的前后步伐,在以后的《尚书》研究中,基本按此做。只是补充了些具体项目,或作了较详的规划。也就由于长期忙于《尚书》的各项具体研究,因而就如《尚书通检·序》所说的,一直未去做“最后才下手去作”的“《尚书》全书的考定”。

解放后,顾师1954年在上海写的《法华读书记》(一)中提出整理《尚书》拟作“《尚书》十种”。数月后在《法华读书记》(二)中再度提此十书计划,两次计划有九种相同(惟先后顺序略异),而各有一不同。现在合录其九种相同的如下:(1)《尚书文字合编》,(2)《尚书通检》,(3)《尚书校文》,(4)《尚书集释》,(5)《尚书今译》,(6)《尚书学史》,(7)《尚书学书目》,(8)《伪古文尚书集证》,(9)《尚书学论文选》。其二者各不同的一种,今亦依次列为:(10)《尚书简注》,(11)《金文选》。其后还多次提出过类似计划,大抵同此,只有详略多少的微异,或者侧重点稍不同。这也可说

是顾先生梦寐以求完成的《尚书》研究的十大项目了。

1954年,顾先生奉周总理之命调北京入历史研究所,首先是任毛主席交办的点校《资治通鉴》的总校。接着辅导苏联访华学者越特金研究《史记》。而后自己点校《史记》三家注本,至1958年完成。这段时期无力顾及《尚书》。1959年始奉命整理《尚书》,见其《读尚书笔记》(一)、(五)、(六)三者的“前记”中都记明“奉整理《尚书》之命”。不过其(一)的所记又记明“顾予老矣,百骸都亏,欲予如少年人之力作,势已有所不可……因书其力不从心之苦于此”。当时科学院有每年夏送研究人员至青岛休假的美政。这一年夏顾先生至青岛休假,适逢我也自南京来此休假,师生愉快相见,谈到奉命整理《尚书》,即以上述《笔记》所言之意,要我赴京相助,我自然表示乐意。如上所述,至1962年顾先生请于周扬同志,经中宣部批准,乃调我成功。

顾师自己于1959年起恢复整理《尚书》,考虑应该做《尚书通检·序》中所说的“最后才下手去作《尚书》全部的考定”的工作,就决定整理今文二十八篇。并决定先整理最难读的又是周代历史最重要的《大诰》篇。1962年写出初稿,以篇幅过大,就择要写成《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于《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全文分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五个部分。这是对《尚书》按篇进行校释整理的试作,也作为研究整理《尚书》的样板,学术界极予重视。《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李平心文,盛誉此文优点有五,最后以为全面、系统地弄清《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与脉络,可以说是对《尚书》进行总结性的整理,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

我来整理《尚书》即依此篇体例进行。但我先要对《尚书》作历史的了解,掌握这部书所有有关资料,自然要涉及整个经学有关文献的资料,先花了半年时间每天觅资料于北京市内所有图书馆、旧书店(当时北京市内旧书店还很多),搜集群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情况,用卡片把它记下来,归而取自宋明以迄现在各种书目及文献著录相对勘(自然还要稽之于汉、隋两艺文经籍之志),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又取中华书局图书馆所藏有关历代石经图书、图录、拓片等资料及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有关石经图书等各项资料,撰成《历代石经》;最后据顾先生所藏和中华书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及所能复制隶古定写本原照片、影印本、缩微胶卷本与有关著录、记载,撰写《尚书隶古定古写本》。这三种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全面地系统地力求做到巨细无遗的总书目(这三种后来又经我于1989年访日四个月及1992年再访日两个多月详加搜寻补充了不少彼土资料,使之更臻完善)。有了这三种,就可全面详细占有有关《尚书》与群经的资料情况了。

然后就依据顾师《尚书大诰今译(摘要)》体例,开始撰写各篇,先择夏商几篇中最短的撰写,记得写了《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将其中《高宗彤日》篇油印,邀请当时参加二十四史点校专家二十余人座谈,请提意见。他们提出将顾先生文章五部分中的“章句”部分并入“解释”部分。我采纳他们的意见,定我撰写之文为“校勘、解释、今译、考证”四部分,征得了顾师同意。

“文革”一起,我所撰写各篇全毁,唯幸《高宗彤日》有油印

本,其版本、石经、隶古定诸篇有原始卡片或原始稿,“文革”后得据以恢复。

“文革”既过,尘埃落定,顾先生于1975年托白寿彝先生请于胡绳同志,调我归历史所,我于1976年到所。好容易以六十之年获得坐下来读书研究的机会,得以复我《尚书》故业,以为是平生大幸,力求较好完成任务,用以仰副中宣部及胡绳同志委用之重,亦以不负老师付托之殷,兼以克尽自己所膺学术史上之重责。所幸我体力尚佳,精力尚盛,用能孜孜汲汲,日夜不懈,全力以赴,自1976年至1999年凡二十余年,写出四百五十余万字,百余篇论文,八九部拙著。其中关于《尚书》者五部,而主要的是于今年完成的这部顾师找我来京叫我撰写的主体著作《尚书校释译论》(即顾师《尚书通检·序》中所说最后才下手作的“《尚书》全部的考定”一书)。

关于此书的撰写,于1976年恢复《尚书》工作后即重新开始。原准备按《尚书》各篇依次写下去,而且开始写了第一篇《尧典》的前面一部分。顾师见了,以为《尧典》《禹贡》为巨篇,会占时间多,不如先写后面诸篇。因此我就压下《尧典》,但在其整理过程中,几经研析,以为应该将原改定的“校勘、解释、今译、考证”四部分,再省并为“校释、今译、讨论”三部分,并定书名为《尚书校释译论》,各单篇发表亦称“校释译论”。取得顾师同意后,即先将顾师《大诰》篇按此三部分改写,然后就写《禹贡》之后的《甘誓》篇,由此以下各篇即按原篇顺序依次写下去。至1980年顾师不幸弃世之日,在其关注下已写成了《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

滕》《大诰》《康诰》《酒诰》诸篇,其中经顾师审阅并以顾师与起钐合名发表者,有《甘誓》(《中国史研究》第1期,1979年3月)、《汤誓》(《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1月)、《盘庚》(《历史学》创刊号,1979年3月;第2期,1979年6月)、《西伯勘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1980年6月)、《微子》(《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2月)等五篇。

顾师于1980年12月病逝,我们陷入哀悼中,1981年起即无暇及于《尚书》,首先是助白寿彝师在报上写哀悼之文,而后应各方刊物之请写顾先生小传或某方面学术成就之文。计迄1982年止,为《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光明日报》社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史学家传》,各就不同要求不同侧重或长稿或小篇写成,而《社会科学战线》则约写《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新华文摘》1984年12月转载)。而当我经历了这些后于1983年恢复《尚书》工作后,复历年都有约写顾师传记者,如《国际著名史学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的《作为地理学家的顾颉刚先生》、《文史哲·纪念顾先生专号》的《顾先生卓越的尚书研究》等,在各方纷纷需要了解顾师学术的情况下,因而我勉力应时写了《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由中华书局于1986年出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顾先生学术,以专门一章谈《对古史要籍〈尚书〉的研究》,其中专门一节论析顾师“把《尚书》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阶段”。由于此书是我费了主要力量写成的,所以在许多学者包括美国、德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大陆之学者撰写的七八部论析顾先生学术的相关的

专著中备受称许(见1993年台北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一书的序言所称引)。其中当然专章谈了顾师的《尚书》研究。而有一段时期,有人起而贬抑顾先生学术,意在相扇成风,我以此书力扬师学,用以拥护胡绳同志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说的:“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1989年很多地方要我谈顾先生之学,如在东京大学中国学会及大东文化大学都讲《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在早稻田大学讲《顾颉刚先生之人物与学问》,在二松学舍大学讲《顾颉刚先生与古史辨》,在台北联合报大厦国学文献馆讲《中国现代史学奠基者顾颉刚先生》(此文发表于台湾《国文天地》),等等。由于客观需要分出力量写了关于顾师学术的许多论文与专著,自然影响了我写《尚书》专著的时间,《尚书》篇章只写到《酒诰》上半篇,其下半篇未及写,只好搁下。

当忙了两年写悼忆、纪念顾先生之文以及接着还加上些外力约写的东西以后,我总想到要全力恢复写《尚书》了,但如上所述分出主要力量写别的东西,要写《尚书》本身所余时间就很少了。然而我当时还是想用很多力量来写,而且想就写大篇《禹贡》。这样,我就在1983年开始写《禹贡》。但一着手写,确实问题太多,当时是承顾师《尚书大诰今译(摘要)》体例并作两次删并后的格式写,那么在《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中对《禹贡》的各州确实是无法容纳那么多资料的,因此就促使我想到另写一部《禹贡地理丛考》,把它的结论写到《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的《禹贡》篇的各州中。例如写了第一篇《冀州地理丛考》,共三万七千二